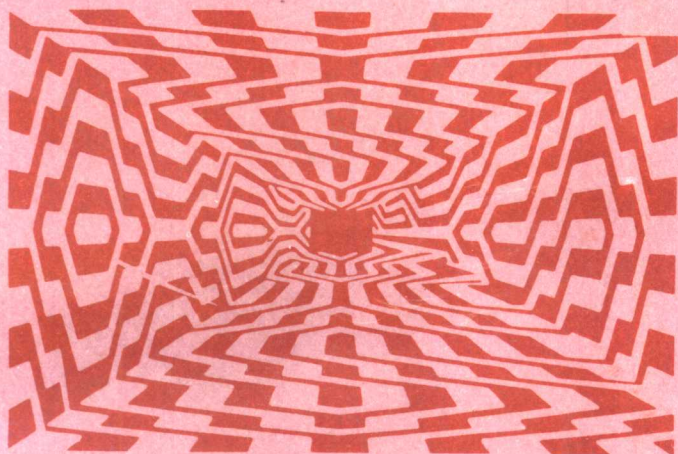


国外文化人类学新论

——碰撞与交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外文化人类学新论

—碰撞与交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国外文化人类学课题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国外文化人类学新论

——碰撞与交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国外文化人类学课题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8.125印张 204千字

印数0001—1000

1996年8月第一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812-9/C·72 定价: 1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言

黄育馥

我们今天的世纪，是人类历史大变动的世纪，是世界格局大变化的世纪，是科技文化大发展的世纪，也是人类自身不断面临时代新挑战的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之深刻，均为以前的时代所不可比拟。生活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人类在享受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快乐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能源危机、此起彼伏的政治、民族、宗教冲突……这一切向人类提出了新的挑战。

和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一样，人类学不是一个静态的学科，而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问题的产物，是一定时期内人类学家所处文化环境的产物，并依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作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文化人类学，则因其与社会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更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何准确地反映今日世界的社会文化现实，如何认识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是时代向文化人类学家们提出的新课题和新挑战。近二、三十年来，文化人类学家通过不断积累有关人类行为和信仰的准确的民族志信息，通过不断对有关人类文化的理论观点进行检验和完善，已经使他们的学科成为一个研究范围广泛，分支学科众多，并且在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的学科。当代国外文化人类学研究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人类学研究功能的转变——文化批判

随着当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和现代化传播手段的不断更新，生活在20世纪的地球上的人们彼此了解的机会大大增多，不同社会之间日益相互依存，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文化人类学以记录具体的文化和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为己任，它的发展变化也离不开整个文化和文化观的变化。

自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在思想和理论上有许多新的发展，先后出现了法国结构主义学派、认知人类学派、符号人类学派、新功能主义学派、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和行为论人类学派等多种不同的学派。关于它们以及它们的理论观点，已有不少著作论及，本书不拟在此重复介绍。本书要着重展现的是在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中已汇成一股重要潮流的文化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文化人类学也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批判的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越南战争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在其内外事务中遭遇的一连串挫折和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一系列文化矛盾，使一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文明，因此，人类学家不必对它一味地加以美化，更不应该就一些陈腐的概念争执不休，而应该正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实，展开有力的批判，使人们从幻觉中醒悟过来。他们逐步把研究对象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社会问题，并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去进行反思和批判。他们主张，文化人类学不应当只限于对异国习俗风情的漫不经心的收集，而应将丰富多采的文化用于反省自我和发展自我；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不应当

单纯出于对描述他文化的兴趣，而应当是为着进行有条不紊的文化批判，将他文化的现实与自己所在的文化现实加以对照，以获得对它们的更加正确的认识。一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提出，今天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建设应作到：能对文化人类学家自己所在的社会提出有价值的批判；能启发人们认识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人类文化，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文化不过是世界上存在的多种文化中的一种；使人们通过文化人类学获得恰当思想和观点，以指导其自身的行动并面对他文化的成员。西方人类学中的这股潮流的形成和发展表现出文化人类学功能的变化，即从只强调对异国文化的描述功能逐渐转向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功能，反映了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生活批判逐渐合为一体的趋势。

二、文化人类学研究地域的转移——回归故里

进入19世纪以后，人类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它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解加深和在方法论方面的进步，还表现在近几十年来其研究地域的逐渐转移。

自本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文化人类学家中出现了回归故里的趋势。在此之前，按照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一名人类学系的学生如想获得博士学位，就必须到某种异国文化中去从事实地调查。文化人类学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这种文化与研究者本人所在的文化差异越大越好。人们认为，理想的训练应当包括让研究者经历一场巨大的“文化冲击”，而这种冲击只能来自完全沉浸于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中。

然而，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却不再漂洋过海地去从事实地调查，而是“回归故里”，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

他们本国的社会。他们不再那样热衷于为着收集知识而收集知识，而更关心将知识用于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造成这一研究地域转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育密切联系实际。学生们关心的是“我怎样把我在这门课程里学到的知识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而这也正是学生家长和整个社会关心的问题。这一注重应用的趋向促使文化人类学家更加关心本国的问题。第二，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曾因其与殖民主义的暧昧关系而在殖民地国家声名狼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某些西方人类学家或自称是人类学家的人打着研究的幌子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事实更使得后者对人类学家怀有戒心。一些原来欢迎人类学家的国家开始限制西方人类学家在它们国家里的活动。如印度曾长期是西方人类学家从事实地调查时喜欢去的地方，但也曾一度对那些希望在它的国界内从事参与观察的西方人类学家关闭大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则规定每一名到那里从事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必须安排一名本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并让其充当助手。这些规定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承受的经济负担，因此几乎完全杜绝了美国人类学家在这些国家从事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人类学研究资助经费紧张，竞争激烈，资助部门期待每付出一个美元都能换回有效和实用的知识。第四，多数西方人类学家的家庭为了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夫妇双方都就业。鉴于实地调查通常需要用一年的时间外出，如果夫妇中的一方出国考察，另一方就须请一年假，子女的上学问题也难以解决。因此，许多人类学家一旦成家，就将研究的兴趣转向国内。上述因素导致越来越多的文化人类学家关心本国的问题，表现出一种面向本国，注重实用的趋向。

三、文化人类学家成分的改变

——打破西方人的垄断

文化人类学研究始于西方。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前苏联的人类学家也十分活跃。自6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家的成分出现了变化，突出地表现为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以色列等，涌现出一支文化人类学家的队伍，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人对这一学科的垄断。他们把本国关心的问题与西方人类学传统地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取得了适合本国需要的研究成果。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如于1948年成立的印度人类学调查局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学研究机构，有力地支持着印度学者从事实地调查，以解决国内的多种问题，许多邦政府也为着同一目的建立了有文化人类学家参加的文化研究所。多数研究所不仅收集统计资料，而且直接帮助完成有关的发展规划。例如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农村发展研究所、东北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社会研究和应用人类学研究所等，都从事这样的工作。印度政府福利部也以多种方式加强对研究的财政支持。目前，印度人类学家研究的问题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教育、卫生保健、营养、婴儿喂养，家庭生育计划研究、人口研究、法律、犯罪和犯罪团体研究、农业发展、劳工问题、城市化、工业化和工业管理、政权研究、部落骚乱和部落管理等等。

总之，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家通过他们的研究，更多地了解了人民的需要和本国的国情，掌握了大量社会相互作用中人的方面

的情况。他们关心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为解决各自社会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这不仅表明人类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也证明了在有关的人类学分支学科中研究者的实力，说明人类学家们已不满足于在“安乐椅”或“象牙塔”中从事研究，而是向着“社会建筑师”和“社会工程师”的方向发展。人类学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人们的承认。

四、文化人类学研究宗旨的变化——注重应用

文化人类学是对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和进化的研究。它分析比较不同种族、民族、国家、部落、地区或社区文化的异同，探索人类文化的一般和特殊规律。文化人类学有许多子学科，其中主要是民族志和民族学。前者主要描述某一人类群体的社会文化制度，后者则主要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归纳和综合人类群体的性质。

自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人类学本身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文化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彼此渗透，形成了众多新的分支学科，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城市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医学人类学等等。这些分支学科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线，借鉴了其他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人类文化的奥秘，并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它们推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

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它们的出现往往是由于社会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文化人类学在制定和实施社会发展规划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发展人类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以“发展”作为主要研

研究对象，认为人类学无权回避这一当代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问题。发展人类学家的研究与指导和评估社区发展计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凭借自己对小型农村社会或不发达地区的了解，以实际个案研究和观察结果作为补充，常可向制定、实施、或评价发展计划的人们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并提出忠告甚至警告。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发展规划的实施时不是自上而下、从决策者的角度去观察，而是自下而上、从直接受到这些规划影响的人们（受益者或受害者）的角度去观察，他们的见解往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文化人类学家的实践表明，他们已日益认识到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重要性，并越来越关心当代社会的变化和现实问题，努力使文化人类学成为一门政策科学，一项能促进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社会工程。注重应用已成为今天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宗旨。

五、文化人类学研究手段的更新 ——新技术的利用

长期以来，文化人类学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地调查、提问（包括正式提问和非正式提问）、概率抽样（包括随机抽样、分层抽样、判断抽样）等。文化人类学研究一般可划分为4个组成部分，即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理论建构、成果检验和写出报告。这4个部分的工作不是依次序进行的，而是彼此交叉，互为补充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以下4个主要特点：（1）大量的资料是包含在实地调查的记录之中。这些资料往往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不是依专题排列。它们的结构没有规律，在一次访谈中，被访谈者可能谈到许多不同的问题；在一次实地调查中，人类学家会收集到有关多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杂乱无章地分布在

大量的调查记录之中。(2) 多数资料的收集工作都须历时数年方可完成。人类学家通过长时期的收集和积累,才能获得比较完整的资料。因此,他们的资料往往具有很高的“反复利用”价值。同一条资料通过人类学家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组织,才能充分实现它的使用价值。(3) 由于职业道德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以及实践方面的原因,文化人类学家很难通过实验来开展研究。他们的资料一般是被动地收集起来的,能了解到什么就了解到什么,没有任何形式的固定格式或样板。人类学家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中采用的方法可能不同。(4) 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情况。能否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收集到资料,取决于研究者;确定收集到的是哪一类资料以及它的价值究竟如何,也取决于研究者。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上述特点,使得采用现代技术十分必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研究手段的最显著变化是计算机的应用。计算机因其能集多种表现形式于一体,集多种表现风格于一身,而大大提高了它在人类学家心目中的地位。虽然它在人类学研究中得到应用的时间并不很长,在80年代中期进入大众市场,到90年代始得到普遍承认,但发展和普及的速度很快,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应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主要用于:(1) 数据处理。数字统计在文化人类学中是一种重要的方法,随着定量方法的发展,数据资料逐渐被作为研究的依据。在这方面,计算机为人类学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2) 资料管理。通过计算机,人类学家可以方便地储存、查寻和追踪自己需要的资料。(3) 书写。书写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越来越多的出版商要求书稿达到能够照排的水平,也影响了人类学家的写作。计算机还具有其他一些与写作有关的功能,如参考书目数据库、拼法校验程序、同义词程序、提要程序等。这些功能使计算机成为人类学家的得力助手。(4) 符号计算和知识表示。这是文化人

类学家的主要兴趣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加工，这项技术已经可以为文化人类学家所接受，并扩大了计算机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范围。例如，文化人类学家利用计算机模拟模型可模拟一些过于复杂，用普通的分析模型无法模拟的系统。

总之，自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文化人类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外文化人类学家的探索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借鉴。将当代国外文化人类学的新发展和新趋势介绍给我们的读者作为参考，这就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之所在。

在这本书中，我们没有试图对当代文化人类学的全貌作出全面的评介，而是选择和重点介绍了一些在我们看来是重要的或以前国内介绍得不多的问题。本书第一章在论述西方文化论争的演变的同时，重点展示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观，也就是从符号和意义上去解释文化的概念。第二章从总体上展现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新近学术动态，着重介绍了文化批判的潮流及其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第三章主要介绍戈尔兹的解释文化理论，说明当代国外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转向。第四章论述了作为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叉融合的结果的哲学人类学的发展，从价值现象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探寻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源流。在第五章，我们以涵化研究为主题，展示了对文化人类学的这一传统课题的研究在当代的应用。从第六章到第十二章，我们依次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几个取得重大发展的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经济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医学人类学和人类学语言学。本书在最后一章总结了当代应用人类学的新发展和主要的社会功能。

为便于读者了解当代国外文化人类学家的情况，我们在附录中收集了70余名国外文化人类学家的简介。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在书中各章内提到的人物，也有一些书中虽未提到，但我们认为是

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人物姓名一律按中译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并附有原文，以便于读者查阅。附录资料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前苏联近年来出版的百科全书和名人录等工具书，各文种资料的提供者是：英文—王力力；法文—江小平；日文—何培忠；俄文—章若男。在参考文献中我们列出了本书各章使用的主要外文参考书书目。

本课题组负责人：黄育馥。课题组成员包括（按姓氏笔划排列）：马季方、王力力、王宁、刘霓、江小平、阮西湖、肖俊明、张继焦、何培忠、吴博凡、时英、郑海燕、黄长著、章若男。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肖俊明同志曾对全书的结构安排和前五章的内容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时英同志负责对文稿的技术性加工和部分编务工作。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文献信息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敬请广大学术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导言	黄育馥 (i)
第一章 文化论争的继续：实践理性与文化	肖俊明 (1)
一 文化观的碰撞：简单的回顾	(1)
二 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之辩	(4)
三 从文化秩序到文化批判：符号与意义	(10)
第二章 新格局的形成：文化批判新潮又起	肖俊明 (15)
一 文化批判的观念及其沿革	(16)
二 当前的文化批判潮流及其前身	(19)
三 人类学与文化批判的当代关联	(22)
四 当代文化人类学中的两种文化批判技巧	(25)
第三章 理论的转向：解释人类学的兴起	肖俊明 (36)
一 解释人类学及其理论渊源	(36)
二 文化：意义、厚描述和本土观点	(38)
三 解释理论：创新与难题	(42)
四 大趋势：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合流	(46)
第四章 从价值现象学到文化生态学：哲学人类学及其 当代转向	吴博凡 (49)
一 从哲学人类学的起源看其与价值论的关联	(49)
二 舍勒对人的定位	(53)
三 当代哲学人类学向文化生态学的转向	(60)
第五章 文化变迁：涵化研究的演化	马季方 (67)
一 涵化——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课题	(67)
二 涵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68)

三	增进理解, 指导变迁: 涵化研究的应用.....	(79)
第六章	人类学与经济学的交融: 经济人类学的产生和发 展.....	郑海燕 (84)
一	早期经济人类学研究.....	(84)
二	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人类学.....	(90)
三	当代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97)
第七章	文化人类学与发展政策: 社会文化分析的价值	刘 霓 (107)
一	发展与发展研究.....	(107)
二	联系的形成.....	(109)
三	学科内部的争论.....	(110)
四	发展人类学家的困境.....	(112)
五	发展人类学家的角色.....	(113)
六	问题和趋势.....	(116)
第八章	文化人类学向现代复杂社会的转向: 都市人类学 的发展.....	阮西湖 张继焦 (120)
一	都市人类学形成的背景.....	(121)
二	当代西方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	(121)
三	世界各国的都市人类学研究.....	(129)
第九章	人类学家看人类与自然: 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与发 展.....	何培忠 (139)
一	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统一.....	(139)
二	能量的摄取方式与生态系统的平衡.....	(141)
三	当代文化生态学探讨的重大课题.....	(146)
第十章	医学人类学的多学科研究特征.....	王 宁 (151)
一	医学人类学的历史沿革.....	(151)
二	内涵与外沿.....	(153)
三	理论与方法.....	(158)
四	当代医学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160)

第一章

文化论争的继续： 实践理性与文化

肖俊明

现代人类学，自从其问世以来，似乎从未有过片刻的宁静，始终在沸沸扬扬的论争中不断地演进发展。论争的焦点自然是“文化”这一难题。大凡著名的人类学家或文化理论家，无论其研究领域是广泛还是偏窄，终归要为阐发其文化观而卷入文化论战。这场论战从世纪之交开始，直至今日仍未见到任何休战的迹象。在论战的舞台上，各种“主义”、“学说”，“理论”纷纷登台表演，此起彼伏、各领风骚。

当这场论战推演到当代，美国人类学家M·萨林斯不甘寂寞，登上舞台尽展其才华。他的表演优劣如何，我们暂且留待后面评说，只是他的一曲《文化与实践理性》勾起了对往日恩恩怨怨的回忆。

一、文化观的碰撞：简单的回顾

当然，这场论战是由文化这一概念引发而来。文化的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定义是由现代人类学之父“E.B.泰勒提出的。泰勒的定义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这里已无必要再重述一遍。只是这个定义，或者说泰勒的文化观，种下了无休无止的恩恩怨怨。

泰勒的文化观，简而言之，是一种进化自然主义。它有两个